

奥登文集

[英] W. H. 奥登 克里斯托弗·衣修伍德 著 马鸣谦 译 王家新 校

战地行纪

JOURNEY TO A WAR

W. H. 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| 奥登文集 |

[英] W. H. 奥登 克里斯托弗·衣修伍德 著 马鸣谦 译 王家新 校

战地行纪

JOURNEY TO A WAR

W. H. 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战地行纪(英)奥登(Auden, W. H.),(英)衣修伍德(Isherwood, C.)著;马鸣谦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2.11

(奥登文集)

书名原文: Journey to a War

ISBN 978-7-5327-5927-9

I. ①战… II. ①奥… ②衣… ③马… III. ①诗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40116号

JOURNEY TO A WAR

by W. H. 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

Copyright © 1973 by W. H. 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2

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12-640号

战地行纪

[英] W. H. 奥登 克里斯托弗·衣修伍德 著 马鸣谦 译 王家新 校
责任编辑/黄昱宁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5 插页 6 字数 170,000

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0—7,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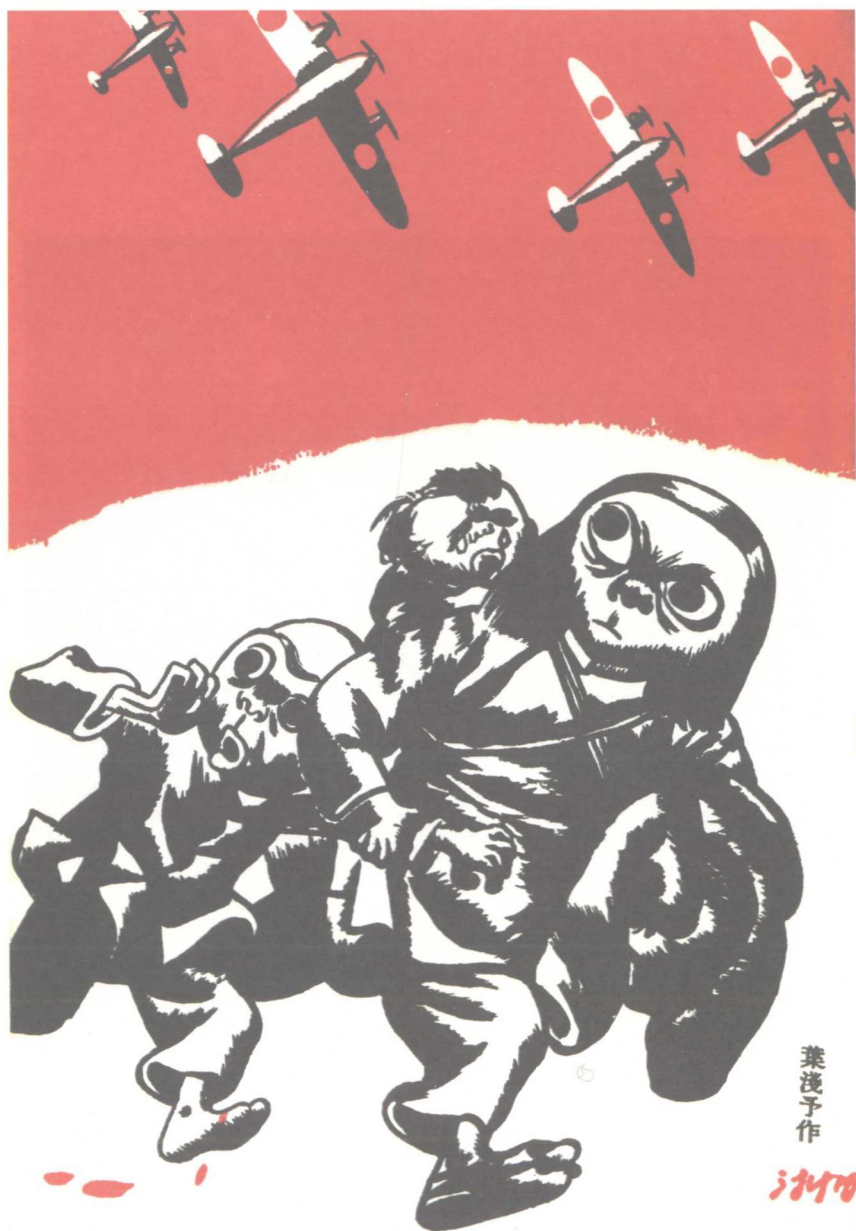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27-5927-9 I·3518

定价: 42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71-85155604



本书作者 W. H. 奥登与克里斯托弗·衣修伍德的合影



葉淺予作

叶浅

Terror Bequeathed

Cartoon by Yet Chian-yu from the magazine 'War-time Cartoons'

原书所用的叶浅予所作的抗战漫画

《战地行纪》中文版前言

《战地行纪》这本书由两位英国人合写而成，对于书中所述的国家及其文化，两位作者都所知甚少。因此，当他们在一个新的文化地理环境里试图摸索出自己的方向时，他们对中国的描述有时故作天真，有时甚至故意落入俗套，如此行文，目的当然在于强调他们作为欧洲人的身份意识。不过，W. H. 奥登和克里斯托弗·衣修伍德却十分了解非正义、侵略和战争，在书写这场中日战争的时候，其笔端自带有强烈的道德立场和深刻的道德智慧。

他们自1938年1月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周游世界之旅，在此期间合作写出了本书。书中内容由大篇幅的散文和两部分的诗歌组成。衣修伍德完成了散文部分的终稿，但他的创作全部取材于他和奥登分别撰写的旅行日记。奥登完成了所有诗歌部分的创作，其中包含了最为杰出的一些诗篇。本书最后所附的十四行组诗，采用了微缩的十四行诗体来探索那些与历史和伦理有关的重大问题。组诗前半部分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，每一首十四行诗都刻画了一种职业身份（譬如诗人、士兵、农民等）及其在漫长岁月中的变迁。组诗后半部分是中国战事的系列画面，每一首诗歌都阐明了日本入侵和中国抗战所体现的道德含义。

奥登和衣修伍德意识到，真实的战争史绝非如历史书籍所叙述的那般精简与单纯。但他们都深知，他们可以在响应这场战争的同

时赋予其道德与智力的明晰性，而他们合撰的这本书也已成为见证其敏锐与智慧的永久的典范之作。

奥登文学遗产受托人
爱德华·门德尔松教授

译者序

一本书，或者说一本经过转译的书，自有其命运。

允许译者所追求的世俗价值，其实只有些许的期望：如果这个译本能够忠实传达原著，并在译者的本土母语中助产其活泼生命的话，也许它会被人记得更长久一点吧。若更幸运一些，此后的某天，一个未来的读者翻阅它时，能被这些篇章深深吸引而会心一笑，那么，一切足矣。

如是，他就不单纯是原著者的一个影子(或者工具)。他更像是一个摆渡人，一个琢磨语言的工匠：借由其创造性工作，来自另一个语言体系的文字，将在一个新的语言国度里寻访到更多的读者。接近这个标准的翻译作品，其意义不下于独立的母语创作。

无须多言，奥登和衣修伍德这两个旅伴，无论在其真实的旅程中，还是在这本诗文合一的旅行读物中，其道德感是毋庸置疑的。在此，我们(包括你，读者本人)理应向他们致以迟到的敬意。

……

进入正文前，读者诸君或许可以花上一点时间，阅读以下两个部分的导读。

这些内容实是很有必要的背景铺垫：导读第一部分从汉弗瑞·卡彭特的奥登传记和其他资料中摘选了部分片段，补充了奥登和衣修伍德写作本书前后的本事经历，以便我们可以更好理解《战地行

纪》两位作者的立意、观点，借此也能深入体察他们的生活实况和真实性情；此外，1938年前后对奥登来说也是一个关键年份，其思想、创作包括生活空间进入了转变期，诗人正向中年的成熟演变，因此，这部分的传记资料对理解奥登其人其作品会有所助益；

导读第二部分是对奥登在本书中诗歌作品（尤其是《战争时期》十四行组诗）的简要评述，参考奥登文学遗产管理人门德尔松教授在其《早期奥登》中的有关解读，译者给出了一个基本框架，有心的读者可从这个评述和诗歌译文后的注解，初识奥登诗歌艺术的堂奥。

著名诗人、诗歌评论家王家新逐字逐句校对了本书的诗歌部分，提出关于修改的真知灼见，在此深表谢忱；

浙江大学的蔡海燕博士亦对诗歌部分的译稿提出宝贵意见，受益良多；

诗人长岛和画家卢苏明在本书翻译过程中一直给予我关切和鼓励；

以及我的家人，为你们无处不在的“良善”。

译者

2011年12月

导读一：《战地行纪》成书的前后

1938年4月20日，在汉口领事馆的临时住处，奥登给友人道兹夫人写了一封信，其中有一段话：“探究这场中国的战争，有如卡夫卡的一篇小说。”

确实如此。

从进程的不可预测来讲，此次旅行堪与卡夫卡笔下K的城堡之行一比。但基本而言，奥登和衣修伍德并不像K那样阴郁，一路上也未遭逢什么诡异不幸之事。这两人刚过而立之年，一个三十一岁，一个三十四岁，带着新晋才子的傲气，外加高中学童的调皮劲儿，在好奇和忐忑中，煞有介事地来到了中国。

此次中国之行，带有某种程度的商务委托目的：就在1936年，奥登与路易斯·麦卡尼斯结伴前往北欧，两人合著的旅行读物《冰岛来信》由兰登书屋和法伯出版社出版后，获得了某种成功：该书入选了英国读书协会的推荐书目，在1937年8月初版印刷了有八千册，这让奥登很受鼓舞。评论界也给予了好评，虽然有人认为此书言辞相当放纵，玩笑过了头，但多数人觉得很具可读性。奥登的收入状况因此改善了一些，《冰岛来信》出版几个月之后，他曾写信告诉一个朋友：“我赚了足够糊口的钱。”出版社建议奥登再写一本旅行读物，但指定必须去亚洲某个国家。当年7月，中日战事的爆发给了他们一个旅行目的地的答案。他们决定前往中国。

在当时英国以及欧美的左翼知识分子看来，中日战争只是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全球对决的远东前线而已，是西班牙事件的一个遥远的翻版：1937年奥登曾去西班牙呆了七个星期，为共和政府开过救护车，在电台的政治宣传部门干了一阵，后来他放弃了电台工作去了阿拉贡前线，结果，他发现政治现实远比他想象的更为暧昧和麻烦。《西班牙》一诗发表后，奥登还因这首诗中的“今天/死亡的几率有预谋地倍增/在必要的谋杀中清醒地容忍那罪恶”的句子，招来乔治·奥威尔的言语攻击，引发了一场笔战。酝酿中国之行的时候，奥登和衣修伍德希望中国不会像西班牙那样，挤满了“明星文学观察家”（衣修伍德语）。对他们来说，中国之行是第二次机会——衣修伍德正懊悔自己没去成西班牙，而奥登觉得自己在西班牙一无所获——因此，中国似乎令人憧憬，恰如奥登本人所说：“我们会有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战争。”

请原谅两位作家小小的私人动机，毕竟，正如奥登所言：“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起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。”这方面，确乎存在着某种私底下的题材竞争。

……

中国之行未定前的一段日子，两人都有些没着没落。衣修伍德写给《新诗歌》的编辑约翰·莱曼的信中提及他本人和奥登的状态时，形容他们两人的未来计划“混乱而不明确”，衣修伍德想去维也纳，莱曼现时就住在那里，可奥登更希望留在英国，“可以省点钱”。

暮春和初夏的某段时间，他们在约翰·派普的乡居别墅参加了

周末聚会，讨论“群体剧院”的未来事宜。可两人开会期间大多在瞎胡闹，似乎对剧院的目标失去了耐心。此前，奥登和衣修伍德的合作的第二个诗剧《F6的攀登》在剧院演出后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，他们开始谋划下一出戏，一出更迎合伦敦西区口味的戏剧。

1937年8月初，奥登和结婚不久的史彭德在肯特郡的海边住了一阵。史彭德刚从瓦伦西亚开完国际作家会议回来，他告诉奥登，安德烈·纪德因为他那本《访苏归来》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抨击，有人甚至直言不讳地宣布，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着想，有关苏联的真相应该禁止发表。奥登对此的评论是：“形势危急绝不应该是说谎的借口。”史彭德后来回忆说，这是他们在三十年代的政治姿态的一个转折点。

8月末和9月初，奥登和衣修伍德去了多佛港，租了东崖九号的一间公寓，开始在那儿写他们的新诗剧，E. M. 福斯特也住在那里——自打六年前被引荐认识后，衣修伍德已与福斯特非常熟悉，他把福斯特形容为“反英雄的英雄”。奥登也同样如此，他在1934年的一篇评论里，谈起过福斯特“对生活神秘性的感知能力”，并把他列为“那些永久而惊人的典范人物之一”，正是以福斯特为代表的这些人物，依然认为经由精神活动，挽救人性的斗争仍有获胜的可能。他们与福斯特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，充满了敬慕之情；《战地行纪》中，奥登的开篇诗歌《致E. M. 福斯特》即是他们与福斯特友谊的见证。

奥登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百叶窗紧闭的房间里写作，福斯特的友人曾描述奥登那时的样子：“他从房间里冒出了头，面色苍白，像

只猫头鹰般眨着眼睛。”除了和衣修伍德合写剧本，他还完成了一首诗歌《多佛港》：

拂晓时鸥鸟哀号如在艰辛劳作：
士兵保护着付给他酬劳的旅行者，
每个人都用相同方式为自己祈祷，却既不能
掌控岁月也影响不了天气。有人或是英雄：
我们不都是那么郁郁不乐。

剧本写得很快——这是初稿很薄的原因之一。衣修伍德8月31日写给友人的明信片里提到“我们的剧本几近完工了”。两周过后，奥登离开多佛，回到了伯明翰西南部哈伯恩的父母家里，他告诉兰登书屋的贝内特·瑟夫：“衣修伍德和我刚刚写好了一个新剧本《边境》。”史彭德和其他朋友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，于是两人又在衣修伍德在伦敦的家中继续修改，10月9日，奥登又返回了哈伯恩，他给此剧可能的赞助人J. M. 凯恩斯(那个著名的经济学家，同时也积极参与艺术事务，筹建了自营的“艺术剧院”。)写信，解释了剧本修改的部分。

11月初，奥登、衣修伍德、戏剧制作人鲁珀特·杜恩与凯恩斯会面讨论了《边境》一剧的演出事宜。凯恩斯愿意为“群体剧院”提供经济支持，并计划在来年开春上演。问题是奥登和衣修伍德随时可能出发前往中国。凯恩斯觉得作者非常有必要在排演过程中在场，因此他致信他们俩，要求他们将旅行出发时间延期至明年

4月或5月。奥登礼貌地拒绝了这个提议：“虽然中国之行是个妨碍，但我想衣修伍德和我都觉得不可能推迟那么长时间。布莱顿和史彭德定会照看此剧的编排事务，我想您也会同样如此。”凯恩斯仍然坚持要他们在场，最终决定等他们从中国回来后再次开排。

可他们的行程又推迟了。奥登收到了一份邀请函，为声援共和政府，英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代表团正打算前往西班牙。奥登打算去两个星期。衣修伍德有些不太愿意去。由于某些延误以及旅行许可的问题，出发行程推迟了好几次。末了，奥登和衣修伍德决定不等了，他们把自己的名字从代表团名单里给划了出来，并且预定好了在1938年1月中旬去中国的船票。

……

这一年的秋天，围绕奥登的文学生涯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：一是《新诗歌》杂志出版了一个奥登评论合刊，他作为一个风生水起的文学运动的旗手的地位得到了确认。埃德温·缪尔^①写道：“对于他的年龄而言，他具有一种特异禀赋，对语言的纯熟控制和想象的大胆，唯有天才诗人才能获得。”格雷厄姆·格林把奥登称为一个“前途远大的最好的在世诗人”。休·沃波尔爵士更直言不讳地承认：“我喜欢奥登的诗歌”；查尔斯·马奇^②认为他“有独创性，仍有些笨拙，风格还未完全成熟……但还是预留了非常多的能量，如果不谈他的诗艺的话，他的个性也定会愈益产生影响。”迪伦·托

① 埃德温·缪尔：苏格兰诗人、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。因与妻子威拉一起翻译弗朗兹·卡夫卡的作品而为人所知。

② 查尔斯·马奇：英国诗人、记者和社会学家。

马斯评价说：“我认为他是一个丰富而深刻的诗人……如同任何用英语写作的诗人那样，极具潜力写出更多的伟大作品……补上一句——祝贺奥登的七十大寿^①。”几个月过后，杰弗里·格里格森^②在《新诗歌》上对此作了总结，他把三十年代冠之以“奥登年代”，将这批应运而生的年轻作家称为“奥登集团”。奥登和他的文学同伴们作为英国文学的新生力量得到了承认。他成了一个符号。

（另一个插曲与詹姆斯·乔伊斯有关，《芬尼根守灵夜》第279页提到了奥登，他对此事的反应是：“乔伊斯，我真的不能说很在乎他，即使我的名字进入了《芬尼根守灵夜》，获得了某种不朽。”在发表于1941年《常识》刊物上的一篇文章里，他对乔伊斯表达了有限的敬仰；奥登晚年曾评价乔伊斯“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天才人物，但也是一个疯子……他要求你将他的作品放在与你的生活等量齐观的关系中，这就好似在说，你必须花费毕生时间来读我，永远不要放弃我，也别想半路逃跑”。作为一个诗歌修辞大师，奥登对乔伊斯是敬畏，还是某种技术上的敌意？）

另一件事，是奥登接受了“国王诗歌金质奖章”。这是个年度诗歌奖项，用以奖掖那些在此前十二个月中第一次或第二次出版个

① 此处应为迪伦·托马斯的戏笔，他这篇短评发表在1937年11月，其时奥登才刚过完30周岁生日。没错，当时发表的原文确实如此，而汉弗瑞·卡彭特在传记中也照录不误。这或许反映出迪伦·托马斯对奥登的喜爱和崇拜，因此可理解为是在预视奥登的创作生命力长盛不衰；再细一琢磨，其中似也有暗讽奥登廉颇老矣的意味，虽然托马斯这个后起诗人的年纪才小奥登7岁。

② 杰弗里·格里格森：英国诗人、作家，《新诗歌》杂志的编辑。

人诗集的作家——奥登因他第二本诗集《看！ 陌生人！》而入选。约翰·曼斯菲尔德，前桂冠诗人，评奖评委会的主席，提名了奥登。1937年11月23日，奥登向文学批评家、好友西里尔·康诺利借了套燕尾服，在曼斯菲尔德的带领下，去白金汉宫觐见了乔治六世，领取了奖章。这件事让奥登的众多支持者相当不满。这是对左翼文学的背叛。斯蒂芬·史彭德，奥登集团中的一员，本希望奥登拒绝这个奖项，认为奥登领奖“成了某种进程的一部分，作家在二十岁左右内心纯正，然后变成了社会主义者，四十岁时智力成熟，最后成了个保守分子”。《新诗歌》的编者按评论说：“也许，奖章本身要比奥登本人可笑得多，认识奥登的人都知道这一点，尽管如此，接受这个金质奖章仍然缺乏正当理由。”

奥登本人对这些赞誉保持了冷静，事实上相当程度地摆脱了虚荣心。这并非他故作谦卑或者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。他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。正是这自信使他得以避开那些阿谀奉承。他不喜欢崇拜者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作品：“他们称赞你，通常是因为某些错误的理由。”他宁愿把一首诗交给一个朋友过目，一句“我喜欢它”就足矣（衣修伍德和此后在美国遇到的切斯特·卡尔曼就是他愿意听取批评的两个人）。在奥登走向生命终点时，他写过如下的句子：

赞誉？并不重要，
但乐于去回忆
当落枕而眠时。

对于刊载出的对他作品的评论，奥登形成了一种超然姿态，当他上了岁数，基本就不大看了。不过他一度承认过：“我们中有些人对评论保持了一种克制的淡然姿态……可我们其实都很介意。”另一方面，成功也没有阻止他对其他诗人心生妒意，他承认每当听说某位同行出版了一本新作，他总会感到不快。

……

这年秋天，奥登在写完了《边境》后，手头还有两件事：一个是选编《牛津轻体诗读本》；10月到12月期间，他一直在为这本书选诗；当他们预定于1938年1月19日启程时，奥登的工作远未完成。出版社希望他在离开前能寄去手稿。于是，奥登临走前将这个未完成的活计移交给了A. E. 道兹夫人（他在伯明翰的朋友E. R. 道兹的妻子）。道兹夫人只得尽力而为。“奥登先生所有的打字稿都需要校对，”她写信给出版社时说道，“他根据记忆给了我参考，很多都是错的。有些诗歌选错了版本……我找到奥登先生所说的那首诗时，却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。”此后几个星期，道兹夫人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有时不得不自己来选诗。奥登在中国旅行期间知道自己的工作做得很不够，启程后他在给道兹夫人的书信中说自己“整夜都醒着，想着《轻体诗读本》所有可能出现的错误”。

另一桩事情，是受BBC制作人约翰·普德尼委托，为一个广播节目撰写台词脚本，标题为《哈德良长墙：从恺撒到全国名胜保护协会》。奥登所写的本子包括了多篇诗篇，有描写长墙沿线的